

学校编码: 10384
学号: 200203003

分类号 _____ 密级 _____
UDC _____

学 位 论 文

从农户的非正式就业看农民的经济理性

——以厦门曾村的出租房就业方式为例

The Peasant's Econmic Rationality
in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House-renting Work in Zeng Village of Xiamen City

潘 峰

指导教师姓名: 董建辉 副教授

专 业 名 称: 民 族 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05 年 6 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05 年 7 月

学位授予单位: 厦 门 大 学

学位授予日期: 2005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05 年 6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兹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的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而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摘要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近 10 年来，中国的农村经历着城市化浪潮的洗礼。随着市场力量绕开城乡的二元结构，从城市向乡村逐步下渗，包括职业方式、思维习惯、经济意识等在内的“市场原子”冲击着农民原有的经营理念。农民的经济行为方式正在被动地经历着巨大的转变。

本研究以厦门城乡结合部的曾村为个案，深入探析在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下，发达地区农民是如何面对社会转型，从事生计活动的。文章以农户的出租房经营为主题，主要通过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结合数据分析和问卷访谈等调查手段，展示城市边缘地带农民的行为方式和非正式就业状况。我最终的结论是，受市场化和社区化的双重影响，农村社区主体的经济行为（主要是出租房经营行为）表现出一种理性和非理性相结合的状态。这一状态可能遵从传统的道德习惯而表现为“社会人”的非理性，也可能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体现出“经济人”的理性。行文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依据、调查方法以及本研究的学术背景和目的。

第二部分，界定本研究的三个核心概念——经济理性、非正式就业和农民。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研究主体。以田野的第一手资料为主，以问卷和数据统计为辅，在特定的社会场景中，深入探讨转型期农民的经济行为，主要包括职业选择、营销行为、定价行为以及投资行为等。

第四部分，结论与反思。回顾并总结关于曾村的调查研究，试图提出城郊农民或“城中村”村民的出租房行为之内在原则，并指出农民的出租房就业是农民的经济行为从生存理性过渡到经济理性的中间形态。

关键词：经济理性；非正式就业；农民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

Abstract

After the China Reform ,especially near 10 years , villages in China have been under the great influence of urbanism. With the market power,steering clear of the dualistic configuration, penetrating from city to village ,the market factors, including way of employment,habit of thought, consciousness of economy and so on ,have impact on the previous work of peasants.The peasants' economy action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this great transformation passively.

The case study picks up the Zeng village in outskirts of Xiamen city, discuss how those peasants make a living facing the great social chan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rbanism. The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house-renting management,using the tools of anthropoloical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statistic and questionnaire ,presents the economic action of peasant and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model. My final conclusion is that with impact of industralization and community change ,the economic actions of local peasant have been in the state of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which maybe show the irrationality when obeying the custom of morality,also show the rationlity when pursuing the maximun of benefit.The context will put this way:

Part One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reasons ,methods and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Part Two definces the three key words,that is,economic rationality,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peasant. Part Three is the main body of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economic action of local peasant in the given social environment using the anthropoloical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statistic and questionnaire as tools.Part Four is the conclusion ,which summarizes the case study in Zeng village,and puts forwards the principle of house-renting management of peasant ,point out the employment model is the middle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s economic actions from survival rationality to economy rationality.

Key words: Economic Rationality;Informal Employment ;Peasant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

目 录

第一部分 导 论	1
第一章 选题依据	1
第二章 研究设计	9
第二部分 概念的界定	13
第一章 经济理性的界定	13
第二章 出租房就业的界定	17
第三章 农民概念的界定	21
第三部分 曾村的个案研究	27
第一章 曾村的基本情况	27
第二章 选择出租房经营作为职业	32
第三章 怎样租出去——出租房的营销方式	49
第四章 如何定价——出租房的租金设定	64
第五章 投资行为——出租房的兴建	77
第四部分 结论与反思	95
第一章 出租房行为的内在原则	95
第二章 出租房经营：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过渡	100
参考文献	103
附 录	108
后 记	112

Catalogue

Part One: Introduction	1
Chapter 1: The Foundation of Choosing Theme	1
Chapter 2: The Design of Research	9
Part Two: Conception Defining	13
Chapter 1: Economy Rationality	13
Chapter 2: The Work of House-renting	17
Chapter 3: The Peasant	21
Part Three: the Case Study on Zeng Village	27
Chapter 1: The Basic Situation in The Zeng Village	27
Chapter 2: Choose the House-renting as A Career	32
Chapter 3: How to Rent, The Marketing of House-renting	49
Chapter 4: How to Price, The Rent Fixing of House-renting	64
Chapter 5: The Investing Action, Set-up the House-renting	77
Part Four: Conclusion and Introspection	95
Chapter 1: The Principle of Action of House-renting	100.
Chapter 2: The House-renting Management: The Transition from Survival Rationality to Economy Rationality	103
Reference	108
Appendix and Postscript	112

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选题依据

一、研究的问题和可能的贡献

（一）研究的问题

20 世纪末到现在，中国正经历着城市化和社区化的洗礼，传统农民的生计方式遭受着巨大的冲击。现代化的脚步逼近，不断侵袭农民的就业、生活和观念形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笔者希望通过对城市化过程中城郊农民的非正式就业的研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农民的身份和职业方式并没有在这一过程中完全实现转化，农民变成所谓的“边缘人”，其经济行为也表现出兼有经济理性与生存理性（非理性）的双重属性。此外，本人也希望通过本项研究，为农民学关于理性的争论提供一个个案参考。

本调查选择厦门城郊的曾村为研究个案。^①我通过两年左右的实地调研，深入探索农民的经济行为，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本文关键概念的界定，出租房的就业方式以及出租房经济行为的内在原则。我的初步假设是：受市场化和社区化的双重影响，农村社区主体——农民的经济行为表现出一种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相结合的状态。换言之，农民可能遵从村落内部的道德、社会安排而表现“社会人”的非理性，也可能基于自利的算计性而体现出“经济人”的理性。

本文要探讨的问题，除了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经济理性，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城郊农民为什么选择出租房经营而不是其他非农领域的职业？农民的出租房经营是一种职业行为还是一种附带的经济行为？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农民是如何经营自己的房屋以获取现金收益，又是怎样处

^① 曾村为研究村落的学名。

理完全“陌生”的经济问题的？^①比如说，如何设置房屋租金？

（二）研究的可能贡献

文章将以农民的出租房就业方式为主题，^②讨论社会转型中的农民是如何尽一切可能地谋求生计，特别是采用出租房的就业方式以规避在正式部门的就业风险，以实现家庭的稳定收入，并使之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本研究将农户的行为分析置于比较客观的视角，因为国内对“城中村”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社会问题的探讨而不能不带上一定的政治色彩。我们还注意到，以往的调研主要依靠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不仅单纯的问卷调查所涉及的“原始”数据令人怀疑，而且实际上，关于非正式就业的官方统计也寥寥无几。相比之下，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却行之有效。进一步说，调查者通过细致的长期观察，与当地建立友好的关系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将明显有助于弥补问卷统计方法的不足。

与以往的城中村研究不同，本调查在选题和研究方式上有一定新意。主要表现在：

1. 选题前沿。李培林指出，城中村现象是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多见于中国的城乡结合部。[1] 另外，以往的学者强调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建设研究、民工潮的弱势群体研究等，而针对失地农民的出租房行为的研究比较稀少。

2. 多视角研究。本调查以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法为主，以数据统计为辅，并且积极地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投资学、市场学、建筑学等。

3. 研究有一定深度。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始终强调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脉络的把握，以及人类学的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观点，并把具体的行为描述和分析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

^①所谓“陌生”并不是指从未接触过，而是指在现代的物业管理制度下，农民的经济行为显得不那么“专业”。毕竟，由于缺乏有关房地产、物业管理等的系统训练，转型时期农民作为“家庭企业家”的行为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

^②这一就业方式属于非正式就业的范畴，本文将在第二部分进行详细地区分和定位。

二、文献综述：有关农民理性研究的回顾

（一）大背景：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理性的争论

虽然学术界有关农民理性的争论长达几十年，但一直围绕着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经济行为是属于“经济人”的范畴还是“社会人”的范畴而展开。

首先，“经济人”的假说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根本。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他认为，人类共享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欲望和潜能，由于政治形态和习惯势力的制约才未能完全发挥出来。他力图将“自私”的概念学理化，将人对利益的追求限制在经济生活的领域中。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继承了“经济人”的观点，并将之运用到农民学的研究中。在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解释中，舒尔茨坚持认为农民同样具有资本家的本质，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对资源的调配总是趋向最优。他于196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贫困的经济学》一文中说：“全世界的农民都在与成本、利润打交道……都是时刻计算个人收益的经济人”。换句话说，传统农民即使是在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也会最大限度的利用各种机会和有效率的资源。这就是舒尔茨的“贫困而有效率”命题。他眼中的小农并不愚昧落后，而是很会盘算的“生意人”。[2]在对危地马拉、印度等地农民行为的观察中，舒尔茨发现，农民没有储蓄习惯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和市场机遇。一旦新技术的给定能保证获得利润，小农生产者会毫不犹豫地接受。[3]（第8-9页）波普金进一步认为，小农可以在权衡长短利益和对各种风险进行评估后，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作出理性选择。[4]美国人类学家S·塔克斯在《便士资本主义：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经济》中指出，农民对价格的反应与资本家没什么差别，尽管他们的资本可能极少，但却表现出“经济人”的逻辑性和算计性。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认为，即使是非理性的经济单位（包括农户），也会因机会的变化而被迫做出理性的反应。总之，亚

当·斯密的追随者认为,无论小农经济是否在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冲击下,农民的经济行为都符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假说。他们奉行经济理论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努力将“经济人”的形象外推到包括农民在内的一切经济行为的主体。[5]

而“社会人”的假设有力地反击了“经济人”的立论基础,对农民的经济理性提出质疑。该假设深受实证主义影响,认为欲对个人的具体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就必须将其放到更大的宏观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社会结构、制度等外在环境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使人们的实际行为与主观愿望相冲突。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民行为的是俄国组织和生产学派的代表人物恰亚诺夫。他与同仁一道在运用长期的、大量的参与观察法研究家庭式农场后,认为小农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并提出“饥饿地租”、“自我剥削”、“亏本经营”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概念。[6]综观他的学说,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在高度自给的社会中,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家庭的消费需要和维持劳动生产的生活需要。所以,用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分析传统农民行为,是不合适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科特在其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不是在追求平均利润,而是奉行“生存第一”和“安全第一”的最低生存策略。为了避免不确定的自然或人为因素,他们以获取稳定产出为生产抉择的标准。[7]沃顿认为,农民行为的脆弱性决定了他们对安全感和生存意识的重视,远远高于追求利益最大化。[8](第412-413页)总之,决定他们经济行为的不是理性,而是道德和社会安排。持“非理性”观点的学者,如20世纪初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传统农民追求的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代价最小化。[9](第42页)荷兰学者J.波耶克认为,农民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一旦生活达到某一水平,就会出现反常的“转向后方”的供应曲线。他在1911年提出了“二元社会”的概念,指出东印度的农民社会与殖民者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就经济行为而言,当

地农民表现出基于道德的非理性，而绝非殖民社会表现出的经济理性。[10]以波尔尼为代表的经济人类学家把农民经济称为“爱与怕的经济”，极力反对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尚未体系化”的农民市场，反对将世界上所有人等同于经济合理化的“功利原子”。[11]综合“理性小农”反对者的观点，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的经济目的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牟利；二是农民的经济行为或是生产劳动不能抽象出标准而一致的经济概念，如投入、产出或效率。

（二）协调争论的努力：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讨论

1. 对贫农和小农行为的讨论

按照农民学的定义，传统小农的经济活动是以家户为生产单位，其主要特点是规模小、高度自给，并且在社会关系上存在宗法性的人身依赖。

对中国小农的研究最有影响的是美籍学者黄宗智。他在对明清时期的华北、江南农村经济运行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农民的行为实际上包涵理性与非理性两种逻辑。一方面，人口压力迫使农民为满足家庭生存的需要，不去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保证最低的产出。为此，他们不得不选择哪怕是边际产出递减的过密化生产。另一方面，随着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深入，小农同样会为追求家庭发展和更多的利润而采用市场化的经营方式。在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后，他指出，在 1350-1850 年间，中国农村人口的压力使土地的单位边际产出递减，主要原因是市场体系不健全、劳动配置不能自用，这使得农户只能维持糊口的生计水平，表现出所谓的“生存理性”；解放后的 30 年间，政府的集体主义公社化运动强行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严重抑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直到 1980 年以后改革政策的推行，市场才具备反过密化的意图，过度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乡村工业、新副业转移。[3]（第 1-19，323-344 页）这意味着农民开始从自给的自然经济以及拒绝商品化的生产理性（生存理性），向以生产要素投入为特征的“经济理性”过渡。

黄平以中国八村的入户访谈资料为依据,认为“生存理性”是促使当代农民主体流动的驱动力。具体地说,农民工在流动中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经验,比较不同的社会和制度环境,选择比较好的就业形式和生活方式。生存理性使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反思行动预期,调整自己的行动目标。[12] (第74-75, 382-384页) 罗伯特·西蒙认为,人的行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特征。在理想状态下,即信息充分、可选参数穷尽时,人总是追求最大利益。但是,现实中的个人决策往往受众多因素地制约(如信息失灵、时间成本高和自身素质等),而表现出“有限理性”。[13] 所以,看似非理性的选择,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满意最大化”或者说是效用最大化。林毅夫继承并发展了西蒙的思想,认为经济理性就是效用最大化,而非物质利益最大化。小农或贫农的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其实是经济理性的一种表现,是在制度、习惯等外部条件制约下的“有限理性”。[14] 傅晨等一批中国学者构建了贫困农户的行为模型。他们认为,贫苦农户面临多种风险,受收入约束,却表现为机会主义者。许多所谓的非理性的败德行为,其实是他们在既定约束下的最优选择。[15] 在利用明清时期的史料分析的基础上,萧正洪指出,陕西的小农实行粗放式农作方式并不是无效率,不考虑长期可持续发展;相反,广种薄收的农业生产能回避或减少气候条件所造成的完全无收的风险,反映出小农在特定条件下的经济“有限理性”。[16]

2. 对发达地区农民经济行为的讨论

国内对城中村农民理性的研究首推李培林教授。之前,许多学者都认为,城中村存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的高速扩张与村落制度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城市的社会理性与农民个体理性的冲突。对此,李培林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城中村”特殊的就业方式和反常规的建筑形式是农民追求租金最大化的理性结果。传统农民的经济选择具有“生存逻辑”与“经济理性”的双重性,但是,城市化迫使农民由传统的“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过渡。[1] (第62-69页) 也有学者提出“逆城市化”

的概念，认为发达地区的农民进行房屋出租是那种靠土地吃饭的传统生计方式的延伸——既是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分配方式的形式上转变，也是农民“生存逻辑”的惯性或冲力的综合结果。

蓝宇蕴的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出租房经济旺盛和内在分配制度的内部化、身份化促使“非农化村庄经济”的形成。由于非正式的分配制度和利益共享观念的存在，农民在追求经济理性的同时，不断强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强调包括地缘、亲缘、拟亲缘关系的“经济共同体”。[17]唐灿与冯小双甚至认为，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形成的巨大经济利益网络，会对外来入产生巨大吸引力，具体表现为，当地人在与外来人的社会互动和经济交换中，越来越多地形成互依、互利、风险共担的“利益一体化关系”。[18]事实上，他们强调的是，为了逃避外部制度（如城市管理、税收部门的规则）对经济利益的影响，本村人往往利用非正式关系与外来人建立合作。这正如赫克特所说的，在一定条件下，为增加更多的利益，群体可能会创造出制度和文​​化系统，以保证这一追求是理性的。[19]这已超出了简单的租赁经济关系的研究，而赋予了农民行为研究许多社会性、组织性的因素。所以，用纯经济模式解释或论证农民的行为是否理性已显得乏力，许多非理性成分如亲缘关系、情理、职业道德等，都可能给争论提供新的视角。

（三）评析

根据学者们的理论取向和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我们拟将其划分为三个流派：

1. 非理性派，以马克斯·韦伯、H·波耶克、波尔丁、斯科特等为代表。他们认为，由于农民的经济行为具有生存理性特征，而决非经济理性，所以农民属于“社会人”的范畴。

2. 理性派，以S·塔克斯、西奥多·舒尔茨、加里·波普金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农民具有企业家的本质，属于“经济人”的范畴。

3. 综合派，以黄宗智、林毅夫、黄平、李培林和傅晨等为代表。他们认

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兼有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的特征。

综上所述，理性派、非理性派和综合派的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但大多停留在证明、证伪和批判这一层面，而对于争论的关键问题讨论得不够。学术争论的最终目的不是争辩是非曲直，而是为了推动农民学理论的再发展，完善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解释。本文的研究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1. 区分还是融合：经济交换与其他生活的界限如何处理？

在对农村社区的农民是否理性的研究中，经济交换领域和其他生活领域的界限明确与否一直是农民行为如何定位的难题之一。在经济领域中，人们使用计量性的货币进行理性的市场交换，依靠强制的契约力量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平衡；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地是使用难以计量的、非理性的社会因素（如情感、思想）进行交换，依靠公认的习惯和道德标准调节人们的社会生活。在非理性派眼里，人的经济关系是深深地嵌入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经济行为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下，是依赖其在文化中的角色进行组织的。波拉尼认为，“人的经济活动总是被淹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他的行动并不是为了保卫他在物质产品的占有方面的个人利益；他的行动是为了保卫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以及社会资产。”[20]（第46页）而理性派坚持，经济生活可以通过学理化，从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抽象出通用的数学公式或模型；而非经济或无法计量的因素，只被当作背景参数，而没能给予应有的注意。具有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双重背景的综合派试图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科中寻找解释农民行为的最佳契合点，他们中许多人都倾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某些元素——既承认农民追求利益的心理动机是绝对的，也认为由于特定制度背景、文化环境和外部条件的不同，他们表现出的行为方式是相对的。总之，学者们研究农民行为的着眼点不同是导致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

2. 经济理性的概念和研究模式来自西方的学术经典，一定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农村社区吗？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